

加强方法论普及,提高社会科学研究的素质

郭志刚

科学研究与日常探究不同,它不仅表现为一种有明确目的的探索,而且是通过极为细致、严谨的特殊方式来进行的。因此,提高方法论素养是使科学研究减少错误、少走弯路的必要训练。科学研究工作更要讲究科学。

具体方法不等同于方法论,它们在科学研究中属于不同层次。方法论(Methodology)是研究过程的理论,属于认识论范畴,是从一般意义上对于研究进行指导。而方法(Method)则是比较具体的研究技术或工具。正确选择和使用研究方法,不仅需要有关研究对象的学科理论指导,也需要关于研究过程的方法论理论的指导。如果对于一般意义的研究方法理论掌握不牢固,那么在使用具体的方法开展研究时就很容易发生问题。因此,在高等教育中加强学生的方法论素养,特别是对研究生的方法论方面的培养,对于提高学生能力、适应社会需要是极为重要的。

一、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的几个原则争论问题

方法论是在长期科学研究实践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在方法论方面始终存在着多种学派的论争。方法论方面的争论有的关系到哲学基础问题,有的关系到认识论,有的则表现在对研究方法的评价方面。

1. 关于社会科学规律

科学是研究事物发展规律的。在自然科学中,这一点已无异议。但是在社会科学中,对于历史演进和社会发展是否存在规律一直存在争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建立的唯物史观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在今天似乎又重新成了问题。在社会科学方法论教学中也存在着这种倾向。

比较流行的一种模糊认识认为,社会规律是人的规律,它要从主体、从人自身去寻找。这种观点甚至被总结成当代社会科学的总特点之一。其实,这种观点在唯物史观产生之前就长期存在,正是唯物史观所批判的对象。唯物史观认为,“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自己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①马克思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研究入手创立了唯物史观,说明了人的发展背后的决定因素,找到了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动力和制约因素,使历史和社会研究从此成为真正的科学。如果不加批判地将当代社会科学特点总结成“从社会基本分析转向对社会主体的活动的分析”,那就很容易导致学生认为社会科学只在抽象的人身上打转转,重新钻到唯心史观的死胡同里去。那么,社会发展也就毫无客观规律可言。社会科学能够作为科学,就是因为社会发展中存在着客观规律。因此,唯物史观是社会科学的理论基础。

相比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确有一些不同的特点。自然现象常常表现为是自在的,而社会历史和现象常常表现为是自为的、不可逆的。因此,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是十分普遍地存在着过份强调社会发展的偶然性、否定社会发展有客观规律的现象。这种观点脱离了科学的、辩证的决定论^②。其实,在自然现象中也同样存在着偶然性、不可逆性,但这并不妨碍自然科学的科学性得到承认。社会科学的科学性之所以经常被怀疑,主要是因为影响个人

行为的因素很多,特别是个人器质和心理经常显得难以把握。尽管如此,必然性仍然会从偶然性之中表现出来。因此,客观世界(包括社会)存在着自身的规律性,这些规律性是可以被认识的。人的精神和行为从本质上也受到客观外界的制约,因此也是有规律性的。

2. 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

从方法论来讲,形成错误认识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没有搞清楚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到底是什么。不少人都泛泛地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就是人,其实并不这样简单。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人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有机体,比如客观存在着的社会制度、经济体制、家庭模式等等。构成这些社会体系的要素并不是人,而是一系列社会存在的构件和方面,包括制度、机构、规范、组织等等。这些社会构件和方面的属性、特征、意向、行为可以通过科学抽象得到概念,将它们定义为一套变量,并经过操作化得到测量。社会科学研究关注的是这些变量体系在性质、结构方面的变化,以及变量之间的数量联系。在这样的研究框架中,个人实际上只是这套变量的载体,在社会统计中称作案例。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是社会变量体系之间的联系,并不直接寻求对于单个人行为的解释。当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变量的载体也可以不是个人,而是婚姻、家庭、组织、社区等其他研究单位。

这样来认识的话,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不仅不是抽象的人,也不是个别的人。虽然社会现象的直接形态是通过个人的行为发生的,但是社会的本质更加体现在它的体系之中。《资本论》是社会研究的光辉典范,马克思从商品这一每个人天天接触、习以为常的事物出发,揭示了剩余价值的产生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指出商品体现了物背后人与人的关系,更确切地说是阶级关系和社会体制。这里人和人的关系,不是个别的人,也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具体的社会历史的人。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

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③所以,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泛泛地使用人的概念,很容易滑向抽象的人而失落了研究目标以致发生概念混乱。

至于现代社会科学中越来越多地运用统计方法,则是从另一角度应用了同一原理。社会科学理论一般针对群组的本质,而针对较大集合时的统计无论在水平、模式、差异和变化方面总是显现出较强的规律性。在社会统计中,一些个体不同于本群组的行为是作为随机波动对待的。即使是这些在统计中被作为随机波动的部分,有时也保持着一定的稳定性。有时,许多深入的统计研究还可以进一步发现这些特殊案例的背后也存在着自己特殊的特征和规律。

因此,社会科学主要采用共相模型(nomothetic model)来解释世界,它不用枚举所有的影响因素,而只选用解释总体时最重要的因素。所以,它实际上是对社会体系和社会运行的部分解释。它的目标是用尽可能少的原因变量提供尽可能多的解释力,解释社会体系中各变量之间的联系和因果关系形式。正因为如此,共相模型不可避免地具有或然性质,并不能解释所有个体的人。这种模型在统计分析中称为简约模型(parsimonious model),而简约性(parsimony)是科学的基本原则之一。

3. 价值无涉观点与客观性原则

很多西方社会科学家在其方法论论著中十分强调“价值无涉”,宣传社会科学解决的是“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而不是解决“应该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说,“科学理论本身不能解决价值判断的争论。科学不能决定资本主义好还是社会主义好的问题。”^④与此相反,马克思的名言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要改变世界,自然要涉及价值判断。不仅社会革命的理论涉及价值判断,保持社会稳定的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也同样涉及价值判断。科学研究是一种实践活

动,而实践是带有目的性的活动。尽管很多科学研究表现为偶然结果,但是目的明确对于研究工作及其他实践活动有重要影响,是没有什么疑义的。并且,实践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中具有特殊的地位,认识世界的目的是改造世界,在改造世界中认识世界。另一方面,科学发展中的许多事例可以说明,即使是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看,研究目的也可以对研究本身产生许多方面的重要影响。

社会科学有较明显的阶级性,超阶级的纯社会科学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存在的。西方社会科学家企图以“价值无涉”使自己超然置身于事外,其实是不可能真正做到的。因此,价值判断是社会科学研究中不可避免的,并且社会科学的结果必然影响社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公然申明自己学说的阶级性,坚持党性(阶级性)与真理性相统一的观点,表现了无私、无畏追求真理的精神。

我们应该划清价值无涉与科学研究中坚持客观性原则两者之间的区别。价值无涉中的确存在坚持客观性原则的部分内容,但是同时还包含了不参与社会、不涉及政治等消极内容。我们在社会科学方法论教学中,强调的应该是真理的客观性,而对于价值无涉的主张则应加以抵制。并且需要强调,在价值判断时也必须贯彻客观性原则,价值判断应该是在解决了“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之后,并以其为依据。所谓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正是反映了这样一种逻辑顺序。正如,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阶级性不是产生于其科学研究的动机,而是这一理论的结果。

4. 关于实证主义和经验方法

在现代社会科学中被越来越多地应用的经验研究方法(empirical studies),有时又被笼统地称为实证方法。有些人把经验方法等同于实证主义,这实在是一种误解。实证主义哲学是一种企图凌驾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力图走“第三条道路”的哲学。它打着反对形而上学的旗号来对抗唯物主义,而实际上难免陷入

不可知论和唯心主义。实证主义的特征是把经验和科学唯心地解释为主观的感觉、表象和体验的总和,否认客观规律的存在,坚持唯心史观。实证论由孔德创始(他同时还是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后来又由马赫发展成第二实证论。列宁曾经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深刻地批判了实证论,并指出了马赫的经验批判主义与孔德的实证主义在原则上的一致性。实证主义在现代还有许多新的发展和变种,在自然科学和社会学中十分流行,对于方法论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影响。在我们学习吸收西方方法论和社会学理论时,尤其需要注意加以批判。

在哲学基本问题和认识论方面,西方社会研究方法论中就贯穿着许多实证主义的唯心货色。比如,在他们的教材中总是把表示客观存在的现实定义为“假定的”存在;而对于事实则定义成是主观感受。这表现出二元论的不可知论。这种哲学基本问题上的不彻底性将会导致在方法论的重要问题上走向谬误。

在实证主义方法论中,十分强调经验研究方法。然而,应用经验研究方法并不等于一定要以实证主义哲学为指导。我们今天越来越多地应用各种调查分析和实验研究手段,是为了加强理论联系实际,加强理论的检验,也是为了取得比较准确的量化分析和预测来指导实际工作。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必须结合,这既有利于反对从理论到理论的单纯演绎推理的倾向,又有利于反对忽视理论、只注重经验的倾向。在科学方法论的发展过程中曾经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演绎逻辑学派与归纳逻辑学派对抗的历史,然而方法论发展到今天,实际上融合了两者。这是因为,研究是一个系列过程,有一个不断循环上升的发展趋势。这两个学派都只抓住研究过程某一部分的特征加以绝对化,结果是以偏概全,从正面走向反面。Walter Wallace 提出的著名科学研究过程图示,将归纳与演绎结合在一起、将观察与思维结合在一起,反映出科学研究的阶段性特点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在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教学中得到

了广泛应用^⑤。

我国社会科学界对近年来的研究方法常有十分不同的评论。有人认为现在缺乏理论研究而经验研究过多,有人认为现在基本还是演绎推理占上风,缺乏经验研究。如果按照方法论理论,一个完整的科学研究既包括理论假说的形成,也包括对理论假说的检验,而在这两部分中都会分别涉及到抽象思维推理和事实材料的处理。我认为,现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所存在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哪一种研究过多了,而在于研究中对理论的逻辑推导和对理论假说的实际检验两者之间的分离割裂程度太大。有的研究人员似乎是天生的假说专业户,不断通过一些片断事实提出新的理论(实际上只是假说),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但从不检验自己的假说。有的研究人员则不需要借助任何理论,只管套用一些新颖的统计技术将所能得到的数据资料变成一些统计指标急于发表,但并不做任何有实际意义的说明和理论解释。这两种情况都代表着学风方面的不良倾向。就方法论而言,两种情况都是将研究停滞在某一阶段,对理论发展贡献很小,也不产生有实践指导意义的结果。这种现象反映出科研人员的方法论素养较差和对自己科研结果的不负责任。一方面,问题的产生往往是由于研究人员不具备全面的科研素质,只对科研某一环节比较熟悉;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界现在存在着的不求甚解、急于出成果的不良学风的大环境,对此也有很大影响。这种局面十分不利于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科研水平的提高。因为,社会科学研究不论是停滞于哪一个阶段,都不是一个完整的科研工作,更谈不上向更高层次的进一步发展。

5. 真理性的检验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基本原则在70年代后期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以后重新得到发扬。但是在科学研究中如何操作、如何判断实践的检验结果,却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实证主义方法论也很讲究用实际资料来检验理

论。但是,他们的方法与马克思主义说的实践检验真理,在根本上是不同的。所以,在介绍西方方法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这种根本区别。

实证主义者把科学假说的可检验性绝对化,过分强调直接经验的证明,强调证实性原则,认为凡不能经直接检验的都不是科学。这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实践检验真理的理论是不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实践是一个活动过程,不能简单归结为直接经验这样的个别环节。实践检验过程是借助逻辑推论的链条进行的,实际上只是逻辑链条的某些环节才可能进行直接检验^⑥。如果把直接检验绝对化,就会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把检验知识真理性的全过程局限于主体感受中。因此,实证主义的证实性原则在方法论上是排斥理论的。在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教材中,经常可以见到实证主义正是以此为根据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的。

由于证实性原则在科学实践中根本行不通,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坚持绝对的证实性原则,很多人退到了后实证主义的证伪性原则。证伪性原则认为理论检验并不是确证,而只是确认(尚未证伪)或证伪。在西方讲台上经常将马克思主义和宗教并列在一起,因为其不存在可证伪性而作为非科学对待。但是,证伪性原则在实践中也存在许多问题。科学史上很多事例与后实证主义的证伪性原则相抵触,很多伟大理论都会碰到许多反面事例,但科学家们并不认为已经证伪而放弃研究,最后终于把许多反常的事例变成能够支持这个理论的正面事例。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辩证关系已经指明了解决问题的出路。证实性原则和证伪性原则都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证实性原则夸大了绝对真理,忽视了真理的相对性。证伪性原则夸大了真理的相对性,否定了绝对真理。这两种实证主义的实证原则都没有认识到,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是一

个不断丰富、完善的辩证的发展过程。由于任何实践都有自己的社会 and 历史的局限性,因此列宁曾经指出:“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⑦由此可见,在引进西方方法论的时候,我们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地加以吸收。我们需要学习西方的实证研究的方法以及方法论中的有益成份,而不是引进实证主义哲学思想。

大学哲学教育不仅应该有正面的教学,也应该对现代流行的种种理论加以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与谬误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一旦与谬误相隔离,它也就成了空洞的条条,失去原有的活力。

另一方面,实际研究工作中还有一种误解,认为凡是直接从实际中归纳出的理论结果即等于理论联系了实际。这是一种片面的理解。理论发展过程中需要在两个不同阶段涉及观察资料:一是在建立理论的阶段,需要用观察资料作为建立理论的原始材料;二是在检验理论的阶段,用另一套与建立理论时所使用的经验材料完全独立的观察资料来作为检验理论的标准。实际上,观察资料的一般归纳并不等于抽象,抽象过程是经过思维活动转向对事物本质的认识。更重要的是,正是由于理论研究必须经过抽象思维,因而既可能发生逻辑错误,也可能发生理论与实际情况之间的矛盾。因此即使是根据经验材料建立的理论,也可能是错误的,也必须经过实际检验。而上述这种误解将“从实际出发”的理论放在免检的位置,实际上是犯了将建立理论阶段混同于检验理论阶段的方法论错误。这种模糊认识,实际上便是方法论中命名为“依据事后解释”的谬误类型。所以,理论研究不仅需要“从实际出发”,而且需要“到实际中去”。

二、借鉴西方方法论中的科学内容

1. 强调理论、观察、统计之间的关系

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有三个要素：理论、观察、统计。

现代科学研究的第一个要素是观察。科学理论关系到科学的逻辑方面，在基础原理的指导下，根据已经掌握的事实，经过一系列的思维过程，对未知的社会现象及其内在规律形成科学假说。恩格斯对于假说演绎方法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曾经有过极高的评价。科学假说虽然还是对于事物本质联系的猜测性判断，但是它在逻辑结构和符合已知事实方面应该不存在问题。它与科学理论的不同，只是在于它所依据的原始前提能否成立。所以它只是对于事物本质联系的一种可能的解释，仍然需要实践的检验。在科学发展过程中，假说是理论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假说是理论形成的初级阶段，随着假说的预见性经受越来越多的考验，假说转化成理论。但是，假说和理论之间并没有清晰的分界线。科学史证明，许多为实践多次检验的经典理论仍然带有假说的成份，需要不断的发展、修正。提出假说除了需要充分掌握科学原理和已知事实外，还要有严谨的科学推理能力，而且还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现代科学研究的第二个要素是观察。观察是为研究取得客观实际材料的过程，它和研究方法直接联系。这里所说的观察是广义的观察，包括应用实验方法、调查方法、实地研究方法等。这些技术方法应该在方法论理论的指导下得到正确的应用。首先，研究目的要明确，即所进行的研究到底是描述型、解释型还是探测型。其次，还要明确研究总体和研究单位，要根据研究的目的和研究的总体选择观察的方法。此外，选择观察方法时还要受到对研究对象控制水平的限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当研究单位是家庭、组织、社区时，是很难采用要求控制水平极高的实验方法去进行的。即使研究单位是个人，由于实验过程会对参加实验者产生很多副效应，也会导致实验结论存在较强的内在无效性和外在无效性。因此，社会科学研究较少采用实验方法进行观察，更多地依赖

调查、实地研究方法。

现代科学研究的第三个要素是统计。由于统计方法和计算机技术日新月异地发展,统计在现代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大大加强了。统计在方法论上更重要的意义是,它可以用来把实际观察资料与理论假说的推论联系起来对假说进行检验。从这个角度来看,统计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技术方法,应用统计时不仅需要专业理论的指导,也需要研究方法论的指导。由于方法论方面的素质薄弱,学生在应用统计方法撰写论文时,经常发生对统计结果的错误阐述,即计算结果是正确的,但是对于这些结果的理解却是错误的。

2. 其他若干方面

西方在方法论方面已经形成了十分严密的体系。它不仅在统计方法、观察方法方面总结了大量的研究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学习;而且在研究设计、理论推理、研究的概念化和操作化方面有成系统的理论。这些方法论理论是开展研究和正确使用各种具体方法手段必不可少的指导。

比如,在研究设计方面,关于研究总体和研究单位的划定对研究的成败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一些常见的方法论谬误是与研究单位不清相联系的,比如生态学谬误、还原论等。虽然这些概念在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中还鲜为人知,但事实上这一类的谬误已相当广泛地存在于研究中。将一些常见的方法论谬误总结出来,并形成专门概念,作为反面样板,是西方方法论教学中的一个特点,它可以提高学生的研究素质和识别能力,避免再犯类似的错误。

又比如,对于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是必须加以认真区别的。因果关系是一种本质联系,而相关关系只是事物表面的数量联系。相关关系可以作为判断因果关系是否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因果关系存在的充分条件。因此,探索事物内在规律还必须考察其他条件。检查和排除现象之间的虚假相关,作为因果关系存

在的另一个判断准则,也是科学研究的任务之一。由于时间先后顺序是判断因果关系的再一个准则(它实际上排在三个判断准则的第一位),因此观察的时间维度是研究设计中的另一重要内容。在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中,普遍以某一时点的横贯调查数据开展研究,如普查、抽样调查等。方法论理论告诉我们,横贯研究使用的是同一时点的观察资料,它比较适合于对于差异的描述性研究,而用于因果关系方面的解释性研究时就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而来自于追踪调查和回顾性调查的纵贯观察资料由于能够提供时间变量,则更有利于因果联系分析。但由于纵贯研究需要更长的时间,更多的人、财、物力投入,更高的研究设计水平,更难的统计分析,因此尚未在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得到普遍的应用。总之,对于差异(difference)和变化(change)的区分,是十分有助于因果关系探索的。由于在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应用更多的是横贯研究,严格地说只能提供关于差异的信息,而不能提供变化的信息,所以我们更需要在得出或接受研究结果时,考虑其方法论方面的有效性。

另外,西方方法论注重对于不同观察方法的适用范围进行认真研究,对各种观察方法的优点和缺点进行了比较详尽的分析和讨论。尤其是,他们认真地研究了对于方法本身的评价,比如开展了对于各种观察方法有效性和可靠性的研究。这些方面在我国还基本没有展开。可见,我们不仅需要引进可以直接应用的方法和技术,而且应该学习与这些方法相联系的指导理论。并且,由于国情不同,一些方法在我国应用时也需要加以改进,在实践中加以总结提高,并做出自己的评价。

三、有关建议

加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普及,提高社会科学研究的水平,应该得到政府主管部门和各高校、研究机构的足够的重视,引导教师和研究人員努力提高自身的科学素质,加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

学习和研究,建设一支高水平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师资队伍。有计划地组织跨学科的教学科研力量进行协作,包括哲学、统计学和社会科学各学科专业的人员以及自然科学方面方法论的专家,尽快形成一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教材。加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专门课程的建设,或者在现有课程中大量充实方法论的内容。同时,还可以组织一些方法论研究的座谈会和学术讨论会,以促进方法论教学研究的交流。此外,社会科学成果的编辑出版是一个重要环节,这些部门也需要提高研究方法论方面的素质以把好关口。同时在科研项目申报、结题、报奖方面的评审工作中,也应该强调对于这一方面的特别重视。

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

② 参阅庞元正:《决定论的历史命运》,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版。

③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页。

④ Eael Babbie, *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 Seventh Edition. Wadsworth: 1995.

⑤ Walter Wallace, *The Logic of Science in Sociology*. Addine: 1971.

⑥ 刘大椿:《科学活动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⑦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载《列宁选集》第2卷,第142页。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